

“大发展的孩子们”: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困境

潘璐 叶敬忠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 中国近30年来唯经济论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为表征的发展模式引发了农村人口流动深化、城乡教育政策剧烈调整、农村社会衰落等多重变迁后果,也使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教育生态更加恶劣。在家庭层面,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对留守儿童成长影响深远;在学校层面,农村教育的衰败与城市化取向使留守儿童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恶化;在社区层面,城乡快速变迁中的乡村价值失范加剧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大龄留守儿童与后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留守女童和困境留守儿童面临更为突出的成长困境。本文结合四川、河南等地社区实地调查中的案例发现,由点及面地论述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伴随发展变迁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并对社会变迁背后的发展主义思维进行反思。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成长困境;发展主义;反思

中图分类号: G40-0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14)03-0002-11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全球化和发展主义的推动下,中国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力图推进经济增长并融入全球市场。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被允许流入城市,这种城乡流动从90年代进入高峰并持续至今。据悉,2012年中国农民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农民工总量达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正是凭借这些“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GDP“奇迹”。尽管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有所削弱,使得乡城迁

收稿日期:2014-05-28

作者简介:潘璐,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

叶敬忠,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

^① 见新华网:《中国农民工去年月收入增长逾一成》,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3/01/c_114857083.htm (2013年3月1日)。

移者实现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依然阻碍着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1-3] 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这些城市务工人员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导致农村外出务工者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权利和保障,多数只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其职业和社会生活状态呈现出鲜明的边缘性、过渡性和变动性。^[4-5] 他们在城市的这种边缘性处境同时导致了一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形成^[6],即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很难实现家庭的整体迁移,只能把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从而造成了一种分离的家庭模式,并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典型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现象。

在农村留守人口群体当中,留守儿童备受关注,自2002年特别是2004年以来进入公众视野。自此之后的10年来,持续的城乡不均衡发展加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并使其常态化、普遍化,留守儿童现象也相应呈强化之势。2004—2005年间的官方话语、学术研究与媒体报道多以2000万为量估算当时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规模。^[7] 至2013年,据全国妇联当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①。8年之间,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翻了两番,数字上的鲜明对比足以说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持久性、独特性以及留守儿童的主题研究所具有的巨大现实意义。由于“留守”的生命历程与儿童成长的密切关系,教育自来是留守儿童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然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策略,在10余年来引发了农村人口流动与家庭拆分的不断加剧、城乡教育政策与资源的剧烈调整以及农村社会的衰落与凋敝。这诸多社会现实绞合在一起,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愈发恶劣,对于农村教育的忧虑与扼腕之叹也因此成为当下学界关怀的主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自2004年起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复杂多变不断拓宽研究区域及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以期加深对发展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理解。自2007年至今,研究团队在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湖南等地的4个农村社区、13所农村学校开展行动研究,通过组织学校活动和社区活动来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在此过程中围绕农村社区与教育等主题进行持续的学术观察与研究。2013年,研究团队在河南省固始县和新县的4个村庄进行了“贫困与社会影响分析:迁出地社会排斥的性别维度研究”,对留守人口、普通村民、县乡村干部等群体进行了177人次深度访谈,获得了丰富的质性资料,对持续近30年的人口流动历程在农业生产、人口关怀、家庭生计、社区发展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进

① 中国妇联新闻:《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文)》, <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2013年5月10日)。

行了分析阐述。本文以上述行动研究和实地调查中获得访谈和案例为材料^①,通过社会学和发展研究的学科视角对当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困境进行分析与反思。处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背景之下的教育领域已然深受发展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教育政策和实践中充斥着以效率、效益和规模为目标的经济理性,从而引发了“农村教育”的日趋问题化。^[8]不仅如此,随着发展思维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与农村留守儿童密切相关的来自家庭和社区的非学校教育形式也受到更大挑战。因此,本文将以发展主义的宏观逻辑框架关注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家庭生命历程和农村社区变迁中正在经历和可能面对的成长境遇,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在这个大发展时代中农村留守儿童所承担的教育与成长代价。

二、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 对留守儿童成长影响深远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在儿童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父母的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儿童成长中的亲子教育出现缺位和中断,这将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家庭教育重要性的类似论述已是留守儿童研究中的基本共识,这一重要性在很多城市务工者当中引起共鸣,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社会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与教育问题的高度关注。然而留守儿童群体依然持续存在,并因其规模数量的扩大使得家庭教育再次成为影响一代农村儿童未来成长的重要因素。从 21 世纪初留守儿童现象初步形成至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农村家庭的人口结构、养育安排以及家庭生命周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成长的初级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

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在经历了 30 年的蓄积与生发之后,已经由最初的一种特异性的经济行为演变为席卷并渗入中国农村社会的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以河南省固始县和新县为例,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历程的变迁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最初在人地矛盾突出、生存极为窘迫的村庄萌发,进而渐次扩展到不同类型、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村地区;务工者群体的构成从最初以冒险、碰运气心态进城闯荡的先锋农民,扩展到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普通农村居民,从青壮年男性为主扩展到年龄周期跨度更大的男性与女性村民;务工者的流动方式也从最初高度依赖地缘网络和帮带关系的特定就业领域,演变为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是跨国性的多元职业分布。河南省固始县大谷村人口流动的变化(见表 1)和四川省青神县四个村庄留守人口数量的变化(见表 2)都足以体现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持续深化的趋势。

^① 文中出现的乡、镇、村、人名以及农村学校名称均作化名处理。

表1 河南省固始县大谷村人口流动变化趋势

	总人口 (人)	劳动力人口 (人)	外出劳动力 (人)	劳动力主要流入地	经济收入中务工 收入比例(%)
2007年	3370	2100	1300	广东	70
2013年	3341	2065	1400	广东、北京、上海、天津	8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查结果整理。

表2 四川省青神县四村留守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总户数 (户)	总人数 (人)	妇女 (人)	留守妇女 (人)	儿童 (人)	留守儿童 (人)	老人 (人)	留守老人 (人)
2011年	3515	11158	4043	389	1767	462	1656	385
2014年	3155	9715	3716	1015	1212	617	1428	965

数据来源: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统计数据。

伴随劳动力流动的持续深化,外出务工群体实现了从第一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国家人口计生委在2012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①。次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更进一步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在20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75%^②。在河南省固始县这个最早加入外出务工潮流的农业县,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动的第一代农民工已逐渐丧失城市务工能力,返回乡村务农;一些“80后”的第二代农民工也在留守与流动之间保持着分离式的家庭结构,他们仍有可能在结束务工生活后回乡务农;未婚的年轻一代务工者与农业和农村的割裂则更为彻底,对于城市生活方式更加认同与向往。

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很多在“流动—留守”的家庭拆分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又以同样的家庭分离制造着新一代的留守儿童群体。在网络上,一则《佛山90后女工早早结婚生子》的新闻提出了“留二代”^③这个尚未被学术化和广泛使用的词汇,也对“留二代”的家庭养育提出了更多忧虑。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上更加认同城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一些未婚年轻务工者甚至成为“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月光族”,相对于家庭责任而

① 中国人口新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http://www.china.com.cn/renkou/2012-08/07/content_26155072.htm (2012年8月7日)。

②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内容概要》, <http://www.moh.gov.cn/ldrks/s7847/201309/12e8cf0459de42c981c59e827b87a27c.shtml> (2013年9月10日)。

③ 中国新闻网:《佛山90后外来女工早早结婚生子,“留二代”诞生》,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05-27/3072580.shtml> (2011年5月27日)。

言,他们更加看重个人主义的物质追求。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身为留守儿童的童年记忆。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使儿童缺乏爱与关怀的亲密体验,亲子分离的留守经历使很多儿童内心孤独、自我封闭,甚至对他们人格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立产生了极其不利的消极影响。如今,曾经有着留守经历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如何为人父母”的考验,他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家庭观和人生观将对自己的养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们是否会成为问题群体。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河南省固始县后厂村,据村妇女主任介绍,村里近3年的新生儿有超过90%无法得到母乳喂养。这些孩子的妈妈在即将分娩时从城市返乡待产,在孩子百天甚至满月之后又踏上了继续外出务工的旅途,孩子被交给家中的留守老人用奶粉喂养。在后厂村,一个临时返乡准备婚礼的姑娘对于自己未来的子女养育也有同样的打算。

张钰兰,女,20岁,在昆山的一家工厂做工,调查人员见到她时她刚回村两天,过年之前要跟邻村的小伙子成婚,结婚之后两人再一起外出打工。张钰兰的爸爸常年在外出务工,16岁时她也开始外出务工,去过昆山、广东等地,后来经亲戚介绍进入昆山的一家服装厂。她从没想过要在家务农,“我从没种过地,不会种地还怎么可能在家务农呢”。她认为自己肯定会继续打工,“不打工连饭都吃不上”,等将来有了孩子,也会像村里人一样,把孩子留给老人照顾,自己出去打工。她说:“现在是金钱社会,什么都需要钱……有舍才有得,舍得了孩子才能挣到钱。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出去打工,这是家庭需要,别人不会指责的。”

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对于扎根城市的未来充满期待,然而在城市的压力与不确定性让他们更易做出将子女留守乡村的决定,这也意味着留守儿童的低龄化与留守周期的延长。作为应对,农村家庭只能通过更长期的祖辈监护来实现留守儿童的养育,在此过程中,留守儿童的生物性抚育受到关注而社会性抚育被弱化。尽管尚未有研究对“留二代”儿童的成长过程进行系统性的跟踪观察,但是可以预测,留守儿童的低龄化与早期亲情教育的缺失将产生严重的亲子疏离,这将关系到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亲子互动,甚而影响其健全人格与心理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成长造成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累积,并将通过代际循环的方式对整个农村人口的发展形成深远影响。

二、农村学校:农村教育的衰败与城市化取向 使留守儿童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恶化

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教育功能,学校在留守儿童教育和成长中的作用也因此而凸显。留守儿童的外出父母和监护人普遍对农村学

校寄予厚望,希望学校在学习成绩的同时发挥更多的教育和监管职能,以丰富的学校生活来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留守儿童自身也对学校的教学条件、教育理念、教学环境等方面有很多期望。然而在发展主义和经济至上的政治思维下,农村学校教育不断异化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和面向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集中地,无法成为儿童全面成长和潜能激发的启蒙者与培养者。在城镇化与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等政策的合力作用下,包括教育在内的农村各种资源以及人口进一步向城镇流动,农村教育被快速卷入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中教育被经济异化,并为“城市中心论”所左右。当下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目标、内容、评价体系 and 资源配置等无不体现出城市主导的发展取向。在城市价值导向下,农村世界的价值在比照中沦为低层级的价值特性。沿着城市取向的价值路径努力攀爬,成了农村学校一致的追求^[9],单一应试性、唯城市性和离农性成为农村教育错位的培养目标。^[10]在与城市教育接轨和竞争的压力之下,农村教育不顾农村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实际,形成了盲目追求升学的风气,而升学率成为对农村教育进行评价的唯一尺码。对于很多农村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学来说,升学率是学校得以在快速的教育城镇化步伐中生存下来的根本。“村不办小学、乡不办初中”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中很多地方所奉行的撤并原则,四川省青神县在其教育规划中就提出截至2016年全县只保留两所乡镇中学的方案。面对不断激化的城乡间教育均衡矛盾,大浪淘沙中仅存的农村中学不得不以更加严苛的校园规训、极化的学生分层甚至是鼓励差生向职业学校提前分流、将分流任务指标化等方式来强化学生管理,确保自身的存续。

四川省青神县临河中学部分作息规定摘录:

6:35,起床铃,起床铃未响严禁说话,起床铃响后迅速起床,鞋跟朝外,牙膏牙刷放在第二格,朝向厕所方向,帕子不要乱放,地面先扫再拖,不得有水渍。

7:40—8:20,早餐,不拥挤不吵闹。早餐后一年级打水。

12:40—13:10,午餐,排队不吵闹。午餐后二年级打水。

17:00—17:50,晚餐,晚餐后三年级打水。就餐时不准将饭菜带出教室,就餐完毕后,经生活委员检查同意后才能出教室。

21:30—22:00,就寝,要求:① 搞好个人卫生,② 不得跑跳闹,③ 不得进入灯光未照到的地方。严禁踏入别人寝室,严禁在寝室内吃东西。

21:55,全部上床,准备就寝,不得做任何影响他人休息的事情。

此外,宿舍装有摄像头,用于监控学生活动情况;每个宿舍门上有一个透明的孔,以便教师随时监视宿舍纪律和卫生。

升学导向下的学校管理方式使农村学生产生了迷茫与厌学情绪,不少学生甚至以越轨、留级、辍学等行为反抗当下的教育体制。教育的城镇化不仅未能如其标榜的那样实现城乡间教育的公平发展,反而缩紧了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

渠道,在炮制出更多教育失败案例的同时也在无数农村学生内心留下了剥夺和扭曲的烙印。难怪河南新县的一位留守妇女在谈及自家及村里学生的就学趋势时诧异而又感慨地说:“父母外出打工都是为了子女上学,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供得起读书了,村里却再也不出大学生了。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读书,这是学校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啊!”让农村学校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怀,使其成为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和关爱不足的重要力量,这样的期望在当下的农村教育图景中显然更加难以实现。

在与农村相对的城市空间中,农村教育的衰败与城市化取向表现为农村学校的上移和农村资源整体的向城流动。正如钱理群所说:“我们的农村教育落入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乡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11]将农村教育和资源向城镇集聚,大多是在社会经济城镇化尚未成熟之前,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以教育促经济。对于农村学生和农村家庭而言,教育城镇化都是一个双重剥夺的过程:它使农民要么被迫为子女求学而付出巨大的财力、人力,要么在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它使农村学生被迫过早地离开熟悉的村庄生活世界,而留守儿童更是在父母外出、亲子分离的境地下面临与家庭的再次割裂。农村教育的上移和城镇化也催生出“陪读”群体和现象。在河南省固始县陆源镇,约有 1/3 的留守妇女在县城或乡镇进行陪读;在河南省新县四光乡,乡镇和县城的学校周边出现了成片的租住区,由留守妇女租住陪读。由于年龄太小,一些父母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甚至要由奶奶进城陪读照顾,“陪读”成为不少留守老人又一沉重的照料负担。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继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之后,以儿童教育为中心的人口流动也进一步加剧了村庄的离散与凋敝。

尽管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已被叫停,但是农村教育资源向城市上移的整体格局已然形成,并且在持续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得到巩固与强化。农村学校的上移一方面使得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增加,留守儿童家庭或是无力继续承担,或是因进城求学陪读而面临家庭结构的再次割裂;另一方面,教育的城镇化收紧了农村儿童的上升渠道,成绩导向的应试教育思想不断强化,扼杀了儿童的发展潜能,留守儿童更加难以从学校教育中获得全面的支持与关爱。由于无法适应或被城市导向的学校教育接纳,大量失学留守儿童、大龄留守儿童在积极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之前被驱入社会,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后备军。

四川省青神县 2014 年约有初三毕业生 1200 人,县高中只招 400 人。作为现存唯一一所农村初中,临河中学每年正取 20 人左右。2014 届的初三毕业班原有学生 53 人,在寒假过后减少为 36 人,流失的学生中有 11 人进入职业学校、6 人选择辍学外出务工。每年春季学期刚开始时,青神县职业中学开始招生。为了保证中职校生源数量,县教育局给县里的初中学校

摊派学生指标,并把招生工作纳入到学校的考核中。据初三班主任张老师介绍,今年该班的指标一共是15个,春招12个,秋招3个,目前还差一个指标尚未完成。“今年春季学期刚开学时,家长和学校的关系很紧张,矛盾很大。家长认为中职校没有学校宣传得那么好,孩子进去后没有学好,感觉被学校欺骗了。”进入中职校的学生很少能坚持读到毕业,大部分学生也只是读一、两个月就外出打工,或者是混毕业证。在全班原有的53人中,大约20人能够幸运地进入普通高中,有一多半学生在初中毕业或是初中毕业一两年后就不得不外出务工。

这些学生正处在人生角色由少年儿童向成人转换的关键期,生理和心理情感的发展、人际交往的变化、生活事件的更迭等极易使其产生角色转换中的困惑与迷茫,更加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学校的引导。然而,留守儿童在父母缺席的同时又结束了学业、脱离了学校教育的范畴,由儿童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使他们更易陷入心理、行为和社会适应上的困境。个别留守儿童因此成为乡村“混混”和问题少年,更多的失学大龄留守儿童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人——城市化的教育使他们失去了对于村庄的归宿感,而对于城市他们也只是贡献劳动的匆匆过客。

三、农村社区:城乡快速变迁中的乡村价值 失范加剧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

城乡社会的快速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出的趋势相互加强,经济增长助推下的社会变迁不仅促生了大量的农村分离式家庭与留守儿童群体,造成了家庭教育的弱化与学校教育的衰败,更从根本上撼动了维系乡村社会团结的基本价值规范。传统乡村社会和村庄是以自然经济和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共同体。作为生活的主要场域和满足生活所需的资源环境,社区中的个体在经济生产、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中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并由此形成对村庄社区的文化与心理认同。在社区共同体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规范、人情网络与社会联结也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在社区层面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和基础。改革开放之后,进入转型期的农民与农户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与独立性,个体的流动性逐渐增大,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与孤立性被打破。与此同时,不断深化的人口流动使农村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与归属感淡化,这种认同危机体现为与传统农村相关的所有生产生活方式和规范整合力量都趋于松散、瓦解。由于其核心的主体、资源与价值规范随经济诱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被抽离,农村社区整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处于留守和被排斥的边缘化状态,守望相助的传统村庄已经成为虚空的社区共同体。

国家政权建设强力渗透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已经使农村社区由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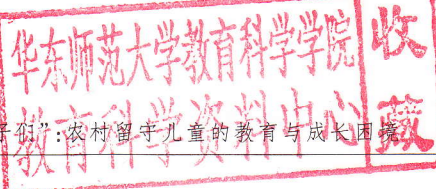
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12],非正式的乡规民约与信任关系难以维系农村社区的秩序规范与社会整合,正式制度与官僚科层体制的控制力量加强。在此之上,不断深化的农村人口流动正在将依稀维持的乡村“半熟人社会”形塑为“陌生人社会”。社区成员强烈的流动动机和较强的流动性冲击着信任与熟识所需的生活根基,常年的流动生活使社区成员变得相互陌生。在河南省固始县后厂村,年轻人大多只记得同村的同学,他们甚至连很多中年村民、邻居的姓名都无法叫出。而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也加速了传统文化、伦理等结构性要素的衰落,敬老爱幼等社会规范底线受到了严重威胁和挑战,村社邻里之间对于儿童的教化、关爱与危险预警作用也进一步削弱,这些都从社区层面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

由于社区非正式规范力量的弱化,一方面,留守儿童因监护人监管不足更易成为社会价值失范的受害者。目前国内中文搜索引擎中关于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犯的新闻报道已达上千起,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事件中的作案者多数是同村的男性村民、长辈甚至是亲戚。这些针对留守女童的性侵害事件不断践踏着乡村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沉重地揭示出留守儿童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的巨大成长风险。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往往因为监护人、特别是祖辈监护人的监管疏忽而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又在农村社区的独特社会环境中面临长期的舆论压力,从而造成巨大的内心创伤。另一方面,社会整体道德规范的滑坡使得留守儿童更易出现个体失范和越轨行为,例如赌博、偷窃、飙车、网瘾、少女妈妈等问题行为甚至刑事犯罪事件。在四川和河南等地的农村社区中,少女妈妈的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小丽,女,16岁,四川省青神县葛村人。据县妇联工作人员和该村妇女主任王大姐介绍,小丽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小丽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小丽在中职校上学期间认识了校外一个社会青年,并与其发生关系,但祖辈并不知情。在怀孕数月之后,小丽的家人才知道这件事,小丽的妈妈匆匆从外地赶回家,照顾小丽生下了孩子。现在孩子由小丽的妈妈在家养育,小丽已经退学和男友外出务工。

李天明,河南省固始县大谷村村书记。他说:“以前村里光棍多,村民因为穷而找不到对象。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着对象,而是年轻人早婚早育。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住在一起怀孕了就结婚。现在农村的初中生、高中生就有堕胎的,女孩子早婚早育的现象更严重,17、18岁就有了孩子。”

未成年人未婚先孕和少女妈妈的现象固然与家庭教育缺失、父母和监护人管教不力密不可分,但是整个农村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规范作用的弱化未尝不是使青少年失教甚至纵容其失范越轨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整个国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理性的大力倡导,农村社区逐渐建立起对商品化和货币伦



理的广泛认同。在河南固始县大谷村,村民用“笑穷不笑娼”这样简单直白的话语描述当下村庄社会风气和社会态度的转变,对物质金钱的追求可以降低道德标准、放宽道德底线作为交换。在社区舆论中,少女未婚先孕这样的事情也仅仅成为村民的饭后谈资,而不再是公众反思为戒的道德事件。由于社区道德规范的弱化,村民对未成年人早婚早育已是见怪不怪,甚至将其视为伴随人口流动而生成的“打工文化”的一部分。农村社区的这种人文环境直接关系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在留守儿童的教育过程中,农村社区所能发挥的以乡土自然为载体、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教育作用正在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冲击下日趋弱化,它所应有的对留守儿童的规范和教化作用在城乡快速变迁的进程中发生蜕变,而这种蜕变也成为当下社会风气颓败的一个缩影。

四、结 论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农村留守儿童最初所面临的家庭教育弱化问题本身就是农村儿童和家庭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背负的沉重社会代价。然而遗憾的是,在家庭分离、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的同时,城市导向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强化加剧了农村社区的空心化和农村教育资源的抽离,使得留守儿童赖以生活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全面倾塌,引发了更严峻的教育缺失与成长困境。在家庭,城市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在超经济强制的迫使与诱惑下离开村庄,它所带来的是留守儿童的低龄化、隔代养育的长期化和家庭教育的极度空缺。随着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和儿童自身的成长,留守经历对儿童的影响极可能注入未来的人口再生产当中。在学校,与经济发展模式相呼应的教育城市化促使更多资源在政策干预下流入城镇,不均衡的城乡教育使家庭和学生自身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它将少数应试精英送入城市,却造成大多数农村学子、特别是留守儿童在教育中的迷茫和角色失败。在社区,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和商品经济中的个体化关注使农业和村庄为根基的文化规范迅速弱化贬值,人口大量流出后的村庄不仅难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持,反而因其自身社会文化氛围的扭曲而使留守儿童面临更多成长风险。

在留守儿童现象和留守儿童教育困境日益严峻的同时,留守儿童中一些亚群体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深入思考,例如留守女童、大龄留守儿童和贫困偏远地区的困境留守儿童。除了近年来媒体大量报道的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犯事件之外,农村社区中大龄留守女童未婚先孕现象呈增多趋势,一些“少女妈妈”由于无法应对突发的角色转变而被迫辍学、外出务工,使自己的孩子过早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继续重复着“留守”的恶性循环。大龄留

留守儿童能否在父母缺席、教育和传统规范弱化的环境中顺利实现由儿童向青年的角色转换,既关系到他们未来的家庭再生产,也关系到他们在城乡发展中的社会融合与适应。在贫困山区和西部边远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往往与贫困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勾连在一起。在推动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同时,贫困所导致的婚姻不稳定与家庭破裂使得留守儿童面临更加严重的亲情缺失,部分“困境留守儿童”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与贫困相关联的儿童营养不良、祖辈监护人文化水平低、农村教育条件差等一系列因素也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身心成长。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总体状况与这些亚群体所面临的突出成长困境,都为思考和探索留守儿童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从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战略来看,政府仍将继续深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脱离土地,更多的资源将瞄向城市,更多的村庄将在城市偏向的发展中虚空洞敝,也意味着留守儿童面临的教育问题将更加严峻。加强留守儿童的教育保护、缓解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已是刻不容缓。这需要教育行动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我们追本溯源,深刻反思唯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给上千万留守儿童带来的教育之殇、成长之痛。

参考文献

- [1]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 [2]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3] 赵晖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175-209.
- [4] 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J].社会,2006,2(26):136-158.
- [5]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A].第17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农民工问题论文集[C].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工系,长沙,2007:157-177.
- [6]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J].2006(2):13-36.
- [7] 潘璐,叶敬忠.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17.
- [8] 刘娟,刘晓林,林杜娟.发展主义逻辑下的农村教育:述评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7-82.
- [9] 李学容.警惕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对农村教育城市化的审思[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6):1-3.
- [10] 周洪宇.农村、农民与农村教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5(1):18-24.
- [11] 钱理群.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J].天涯,2006(4):4-14.
- [12] 贺雪峰.半熟人社会[J].开放时代,2002(1):114-115.
- [13] 段成荣,杨舸,吕利丹.我国大龄农村留守儿童现状[J].中国青年研究,2008(10):25-30.

(责任编辑 李春萍)